

# OBSERVATION OF CONTEMPORARY ARCHITECTURE IN CHONGQING

## 遗传与进化 ——重庆当代建筑观察\*

撰文 褚冬竹 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

**摘要** 1997年升格直辖市以后，重庆进入了一个全面提速发展的新阶段，并从城市设计与标志性建筑两条线索同时展开。基于对重庆近代开端与地理特征的基础阐述，以生物学中“遗传”与“进化”、“基因型”与“表现型”等概念作为新视角与建筑进行比对解读，剖析“建筑基因”的存在及其特征，并探讨基因遗传（传承）与进化（发展）的相关问题，结合部分案例阐明了建筑表现型特征与综合意义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最终提出以“有节制的品质”为目标的建筑可持续发展基本思路。

**关键词** 重庆 当代建筑 地域性 遗传 进化

山城重庆，两江汇聚<sup>1</sup>，夏热冬冷，岩峻坡陡，独特的地理特征构建出一方全然不同的水土。与那些经济更发达、文化更丰厚的东部名城甚至西部近邻成都相比，重庆在大部分历史进程中的地位其实颇为“草根”。“山高水急”的地理条件，在传统技术与交通水平条件下，显然不是大规模宜居之地。1929年，已开埠35年的重庆正式建市（国民政府二级乙等省辖市）时，除蜿蜒的石板步道外，全城竟无一条公路。随后，重庆经历了“战时首都”（1937）、新中国“中央直辖市”（1949）、“省辖市”（1954）、第二次“中央直辖市”（1997）、“国家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2009）、“国家中心城市”（2010）……过去百年，太多的地位与命运跌宕直接映射在了这座城市的建设上。

### 1 蛰伏与跃进

1997年，重庆第二次中央直辖。这个蛰伏多年的西南重镇迎来了改革开放后最重要的历史机遇。当时的重庆有着两个特殊的建设背景，即城市空间格局的多组团特征与文化场馆的极度匮乏。其一，由于山地与两江的分隔，城市中存在大量因坡陡而不利于建设或因江河阻隔而交通不便的区域，只能形成跳跃、分散发展的多中心组团式格局。这种格局势必导致城市中存有大量“未开发”或“欠设计”区域；其二，1997年以前，重庆行政级别相对较低，且城市职能为“重工业基地”，市政建设尤其是文化设施一直处于贫瘠状态，这直接决定了重庆城市新发展的行动方向：“城市设计”与“标志建筑”并举推进。

重庆的城市设计以江北嘴片区城市设计（1998）、渝中区城市形象设计（2002）、“两江四岸”城市设计（2008）等重大竞赛为重要标志事件。标志建筑的建设则以中国三峡博物馆（1999，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重庆图书馆新馆（2003）、重庆大剧院（2004，德国gmp设计）、重庆科技馆（2004，法国AS与重庆市设计院联合设计）、国泰艺术中心（2005）等为代表，初步填补了长期匮乏的文化载体<sup>2</sup>。大学城、两江新区、茶园新区等城市新区的快速拓展引发了城市交通系统（道桥、轨道）的迅速提升，原本大量可远观却不易抵达的地段因交通格局的改变迅速成为黄金地段。自上而下的各项政策利好与积郁释放后的弹性势能为城市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使之在较短时间内呈现出革命性变化。江水、群山、道桥、标志建筑更成为塑造重庆新形象的绝好机会，重庆开始了新世纪的“筑梦之旅”。

### 2 遗传与进化

面对未来，重庆当代建筑到底应当因循怎样的规律或路径前行？剖析建筑，首先要将视野放之于城市。



重庆江北嘴CBD整体规划鸟瞰图（来源于重庆市江北嘴中央商务区开发投资有限公司）



中国三峡博物馆



摄影：褚冬竹  
重庆大剧院



### 褚冬竹

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工学博士；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Lab.C.[architecture]工作室主持建筑师，中国建筑学会会员，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师分会建筑理论与创作学组委员，重庆市建设工程勘察设计专家咨询委员会专家。



重庆科技馆设计方案



四川美术学院设计艺术馆

城市作为几乎承载了人类所有日常活动的空间聚合体，具有诞生、成长、兴盛以及转型或衰落的生命过程，建筑则具有更为清晰的全生命周期。不妨借用两个生物学概念来对应建筑的生命特性：基因型（Genotype）和表现型（Phenotype）。前者指生物体的遗传信息组成；后者则表示某一个生物体所有性状的总和、特定的物理外观，受基因型和环境的影响。基因型是生物体发展的内在决定性因素，但并不是唯一因素。同样的基因型在不同的环境中会获得不同的表现型。与生物体的孕育成长类似，建筑及其设计的诞生与发展也是一个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的演进过程。“淮南为橘，淮北为枳”，基因并不是决定最终呈现的唯一要素，过程中的环境影响是不可忽视的。必然与偶然、基因与环境、需求与条件……一对对矛盾在设计过程中相互平衡，最终凝结为整体的设计结果。

### 3 基因与环境

理虽已明，但如任何一场革命，短促急迫的巨变确实很难周全关照到来自过去的影响，哪怕这“过去”已传袭千年。跃进过后，重庆建筑仍有几个必须要讨论的基本问题。解开这些问题，可以更好地理解未来。

#### > 问题1：重庆是否有自身的建筑基因？如果有，那到底是什么？

如果说“基因”是生物体与生俱来的内在密码，那么建筑既然也有自身的“生命周期”，是否亦存在不因环境改变的、相对独立存在的内在遗传密码？在探讨建筑“地域性”时，其空间、材料、形式、建构等通常被视作地域特性的核心内容，但这些要素显然与一方水土的气候、地质、物产、技术乃至生活习惯密切相关，是后者的衍生之物和外显之物，随周遭环境可能产生不确定的改变。建筑基因应为建筑使用者（广义）对于建筑的各项基本需求，也正如生物学中具体使用的基因概念，通常是指某一性状的基因。而整个生物的基因是无法整体表示的，“建筑基因”也是一个由大量难以计数、不同角度、不同尺度的需求构成。这些需求是建筑得以产生的根本源泉，也是直接推进设计发展的原始动力，更是设计与建筑完成后评价成果的基础标尺。

如刘家琨在四川美术学院设计艺术馆中将清水页岩砖、混凝土空心砌块、镀锌白铁皮甚至螺纹钢筋等低廉材料极为“生猛”地组织入这一组小型建筑群中，通过材料、形态、空间回应（或暗喻）了川美老校区所在的旧工业区以及重庆作为传统工业城市的城市性格，也将建筑外在形式与美术院校对空间的根本需求牢固地关联起来。

在满足需求（即建筑基因）的基础上，因地域场所不同而呈现的空间、材料、建构等则是因回应不同环境特质而衍生出的“表现型”特征，也成为解读传统意义上的建筑生成的一个基本视角——从内核读建筑而非从形式读建筑。重庆与其他地域的环境差异以及重庆城市内部的不同环境特征，决定了建筑基因所面临的环境影响因子，而对内在需求的剖析则成为可能的创新源泉。如果说刘家琨在校园建筑中可以将建筑师心目中的“本源联系”质朴、直接地传达出来而无需过多考虑市场环境，那么置身于市场中的房地产项目则必须从更多样、更复杂的要素中切中要害，直击市场“需求”，才可能既适应当下市场环境又能在相对长的历史检验中获得自身地位。



重庆天地（瑞安新天地）

“重庆天地”商业组团项目（即瑞安新天地，Benjamin Wood设计）修建在一片旧工厂区（渝中

区化龙桥片区），场地原有建筑已全部拆除，没有任何可以作为改造或是利用的建筑记忆。初看设计总图，建筑纵横交错，全然没有现代规划布局原则的痕迹。建筑师在对场地高差、交通特点、重庆近代建筑乃至城市特征全面分析之后，充分利用了近代重庆建筑语言、传统廉价的地方材料以及颇为复杂的外部空间关系，“制造”出一片颇为自然的全新“旧”城，为缺乏舒适步行空间的重庆提供了一处有着示范意义的场所。这个项目并非学院派意义上的建筑学革新，却是优秀执业建筑师对本地风土、行为偏好的一次深刻解读和市场回应，对其后重庆乃至周边城市的类似设计项目有着深远的影响。

### > 问题2：建筑基因与环境应当如何互动，才能够实现建筑的进化？

通过上述对建筑基因存在合法性的分析，已经自然地回答了这一问题。我们熟知的传统重庆（以及川东地区）建筑中的空间、形式、材料在环境特征（不仅包含狭义的自然环境也包含技术、文化与经济环境）不断变化下也发生着相应的变化。这本身是自然合理的，但由于“眼球经济”（或称“视觉吸引力”）在当下消费社会中显著存在的商业价值，导致了大部分城市对“新颖”的过度追求。在诸多创新类别中，对形式做出改变最为快捷和廉价。因此无论中外，“如今的许多城市都想要成为这种拼贴城市。创造统一性和和谐性的能力与愿望在当代城市中似乎已经消失了。每个人只要盖了点儿什么，就想被人注意，不管他是委托人还是建筑师。”<sup>[1]</sup>从根本上说，这种仅在形式表层的变化并不是建筑基因与环境互动的结果，而是经济学层面的一种趋利规则。

2011年岁末，来自新加坡的“嘉德置地”（CapitaLand）旗下的“凯德中国”突然抛出在重庆咽喉要位朝天门的超大型开发项目“重庆来福士广场”效果图。建筑由著名建筑师莫什·萨夫迪（Moshe Safdie）操刀设计，8栋超高层建筑所组成的巨大建筑集群耸立江畔，高楼的顶端是巨大的空中花园。该设计立即引发了广泛讨论乃至争议。质疑并不在于这个建筑的形态到底怎样，事实上我也并不认为它前卫到难以接受。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个方案是否真的理解和尊重了朝天门特有的场所关系？是否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是否有与该建筑师其他项目过于雷同之嫌？重庆是否用地紧张到连这样一块用地都需要付出如此之高的开发强度？这些问题显然已经不是建筑师所能回答的。

同样，重庆当代新建筑的代表作“重庆大剧院”（德国gmp设计）也以十分独特的折线形山岩作为形式来源，且占据着几乎是整个重庆中心城区最好的标志性地段。建筑通体以玻璃幕墙作为表皮，形成完整的几何体块形象直接“放置”于广场之上，以巨大、整体的形象向来自两江对岸展示着独一无二的形象。且不谈该建筑与gmp早年设计的挪威奥斯陆大剧院方案（未实施）形象有着显而易见的类似，单从建筑与环境的关系角度，它也很难成为一座真正属于市民的建筑。整个建筑除了通向室内大厅的前后两处主入口（但演出前需凭票进入），其他位置几乎没有任何一处空间有积极、交融的室内外联系。在冬季寒风、夏季骄阳或滂沱大雨之时，该剧院外墙四周几无藏身之处。这个建筑在为城市留下远距离宏观形象的同时，是否还应该关注它脚下的微小人群？

环境对建筑的影响是综合而微妙的。汤桦在重庆大学城内设计的四川美术学院图书馆与重庆大学图书馆可以形成颇为有趣的比较。以同一位建筑师在相隔一条城市道路的两个大学校园内的两个全然不同的作品，可以看出建筑师对于不同规划思路、不同空间条件、不同业主思想的巧妙回应。

### > 问题3：地域性建造方法、特征能否在现代城市发展道路上传承？如果能，如何传承并发展？

既然环境发生改变，那么所谓的地域性建造方法若被简单固化，便已不再具有真正的“地域性”。此时需要提出与地域性同等重要的另一个建筑背景——时代性。这已无需过多赘述，建筑本身无法跳出其所在的时空坐标，几乎所有的时代环境特征都在建筑诞生过程中对其有着或深或浅的影响。除了部分必须以复原、保护为手段的历史建筑再现，建筑需以这个时代作为思考背景，对其所在地域的综合环境（自然、经济、文化）加以考量，从建筑基因内核出发探讨其外在表象。建筑诸多传统表现型特征与今天的环境事实上存在着颇为激烈的经济博弈。对于任何建筑，显然是无法绕开同时代环境的，无论是想回到过去还是提前抵达未来，都注定不会是一个自然的选择。许多在过去十分经济的材料选择、建造方式，在当下的环境条件中却需付出更高代价，甚至变为小众的奢侈。

建筑永远不是在洁净实验室中的产物，它必然要深深地扎根属于自己的土壤。迅猛而缺乏慎思的发展速度、事实上仍旧存在的巨大城乡差别、地域性的快速消褪……已成为当下重庆乃至中国建筑实践过程中的基本背景。这个背景是赤裸裸的，是直击包括建筑师在内的每一个亲历者的。当代中国的现实，需要我们去直面。如青年建筑师钟洛克在重庆渝州宾馆国际设计中，面对政府接待宾馆这一特定命题，清醒回应相关形式诉求，在建筑师创新与形式规定之间寻求了一条协调之路，并在形式的背后进行了执着的探新。



重庆来福士广场方案效果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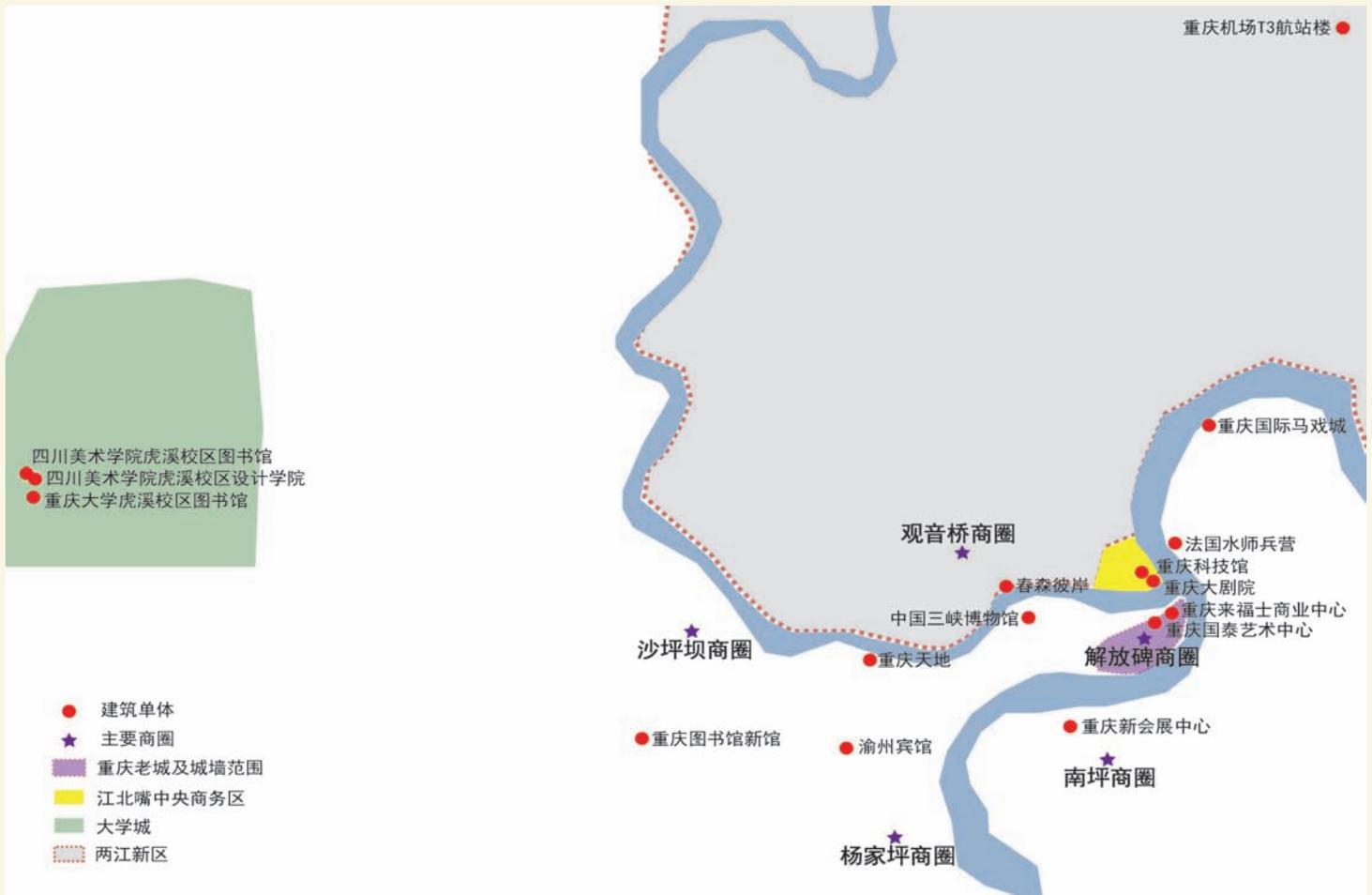
重庆大剧院与场地关系



四川美术学院图书馆



重庆大学图书馆



文中所涉及的建筑在重庆的区位关系（作者自绘）



重庆渝州宾馆改建

#### 4 作为结语：有节制的品质与风格无关

当前重庆建筑遭遇到的最根本问题与挑战，不单是传统形式与风貌是否得以存留，更是迅猛的经济发展速度与必须审慎思考的空间可持续性之间的矛盾。城市空间的可持续性又具体体现为激增的城市空间需求与有限的用地条件之间的矛盾。矛盾的解决之路也正是重庆建筑的品质提升之道。高密度、立体化、综合性、气候适应性、地形适应性理应成为未来重庆建筑的研究和实践方向。面对现实，若不从源头开始思索，设计无法在根本上面对未来。

可持续建筑的内涵，正是在时空背景的不断变幻下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调整，并在“合理限制”的约定下尽可能地提升和满足人类各项需求的能力，即一种“有节制的品质”。拂去建筑上的种种形式噱头，从特定空间和时间的河流中探寻建筑本真的建构之路，而不是迷恋、借鉴与抄袭。这样的品质，其实与风格真的无关。■

\*注：本研究工作得到了“十二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2012BAJ15B00）资助以及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106112013CDJZR190002）资助。

注释

1 “两江”指嘉陵江、长江。

2 从2003年开始至2012年间，重庆市政府数次提出建设十大文化设施的计划，其内容随着建设推进不断刷新，数量实际上已经超过十个。据不完全统计，这些文化设施包括中国三峡博物馆、重庆大剧院、重庆图书馆、重庆科技馆、国泰艺术中心、重庆自然博物馆、重庆国际马戏城、重庆工业博物馆、重庆影视制作基地、重庆书城、重庆市群众艺术馆新馆、重庆国际会展中心、重庆城市规划陈列馆、重庆美术馆、山城电影院、重庆少年宫、南山植物园等约二十项。

图片来源

文中未注明来源的图片均由各项目的设计单位提供

参考文献

[1] 丁沃沃, 胡恒. 拉普尼亚尼. 宽容的秩序之城. 建筑文化研究(第1辑)[M].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9(136).